

# 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Historical Reviews and Reflections on Prehistoric Site Museums in China

张礼智

Zhang Lizhi

(西安半坡博物馆, 西安, 710043)

(Xi'an Banpo Museum, Xi'an, 710043)

**内容提要:** 回顾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70年的发展历史, 可分为20世纪50年代、20世纪70—90年代和新世纪三个发展阶段。史前遗址博物馆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及创新之举,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史前遗址博物馆发展的期许。

**关键词:** 史前 遗址 博物馆 博物馆史

**Abstract:** The seventy year's-history of prehistoric site museums in China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stages: 1950s, 1970s–1990s and new era.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s of each stage, which served as building blocks for some expectations of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s.

**Key Words:** Prehistory; site; museum; museum historiography

遗址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大家庭中一支重要力量, 而史前遗址博物馆又以其鲜明的个性在中国遗址博物馆中独领风骚。梳理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发展70年的历程, 可见其发展模式不断创新, 发展阶段与时代同步, 两者相映生辉、伴随始终。

## 一、关于史前遗址博物馆定义的讨论

名正言顺, 这是普遍的学术规律。

但是, 在梳理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发展脉络过程中, 发现学界并未就其准确概念进行过深入讨论。“原始社会”或者“石器时代”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史前”的含义, 但是史前遗址博物馆已经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形态, 其内容已远超出“原始社会”“石器时代”所指称的以“原始人”为主要内涵的认知, 如在火山爆发、冰川运动及其他古动植物化石遗址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被纳入史前遗址博物馆范畴。就此, 史前遗址博物馆定义的学术讨论成为亟需。

在此以“史前”“遗址”“博物馆”三个概念分别讨论。

博物馆的定义是明确的, 按说没有讨论的必要, 但是在本文特殊的语境中却是一个有必要面对的大问题。因为涉及谁是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的问题。

1953年，中国猿人陈列馆建成开放。仅就时间先后，中国猿人陈列馆早于西安半坡博物馆，应属于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在公众眼中和媒体上都认定“西安半坡博物馆是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甚至在一些业内同行的研究论著中，也持这种观点，其认识基础便是“陈列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事实上，“陈列馆不是博物馆”的认识过于偏狭，就“展出收藏品，公开为社会提供服务”这个根本的、核心的概念上，“陈列馆”与“博物馆”并无二致，如果非要厘清其区别，大概只是“陈列馆”可能存在规模和服务项目方面较之“博物馆”略有差别而已。有鉴于此，笔者认定中国猿人陈列馆为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不仅如此，现实中，一些以“文物管理所”“史前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为名，行保护、展示史前遗址之实的机构，实质上属于史前遗址博物馆。

关于“遗址”，这也是一个本无须讨论的话题。但是，当“遗址”与博物馆组合成新的名词时，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了。“西安半坡博物馆”名称中并无“遗址”字样，但因为半坡遗址是该馆的重要展出内容，对其史前遗址博物馆的性质并无异议。但是有的博物馆名称中没有“遗址”字样，也没有可供参观的遗址发掘现场，是不是还属于史前遗址博物馆，如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还有的不是以史前遗址命名，而是以史前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是不是也需

要做出是否是史前遗址博物馆的界定，如北京平谷的上宅文化陈列馆等？这些均对遗址博物馆的讨论多有困扰。目前经过多番讨论，逐渐形成共识：只要建立在史前遗址范围内，且负有管护史前遗址的责任，也能够看到史前遗址环境的博物馆，均属于史前遗址博物馆。换言之，“史前遗址博物馆”语境中的“遗址”，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开放的史前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二是博物馆负有研究保护史前遗址的责任；三是博物馆位于某一史前遗址的保护区域内。具备其中任何一项的博物馆，即属于“史前遗址博物馆”。

再说“史前”的概念。一般来说，“史前”多数是和“原始”“原始人”“原始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大抵没错。比如，就中国古代史而言，距今4000多年前的夏朝建立之后，中原地区就结束了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事实上问题要复杂得多。比如台湾省新北市的十三行博物馆，其依据建馆的十三行遗址距今最远的时间只有1800年，依然属于台湾的史前遗址。

考古学界对“史前”有了一个简单而精确的定义，即“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这个定义既准确描述了“史前”概念，又照顾了世界各地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且这一定义不但延长了史前遗址的下限<sup>①</sup>，更为重要的是，将史前遗址的上限延伸到人类诞生之前的一切动植物的遗迹、遗骸化石，以及一切自然现象，诸如火山爆发、冰山活动等遗迹。

综上所述，对“史前遗址博物馆”定义为：在文字记载以前的遗址（包括人类文化遗址和自然遗址）发现地建立的，以收藏、展示、管护该遗址为己任的陈列馆、博物馆，以及文物管理所、史前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地质公园等机构均属于博物馆学意义上的史前遗址博物馆。

## 二、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历程

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20世纪50年代：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初始

1953年，中国猿人陈列馆开放，中国博物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史前人类生活遗址为内容的专门博物馆。北京猿人化石

① 本文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十三行博物馆纳入史前遗址博物馆，就是基于这一定义的考量。当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学界的不同看法。这只是基于目前状况的认识，如果将来有新的资料和理论否定了这种认识，我们也欣然接受。毕竟学术研究本就是不断扬弃，螺旋形上升的一个过程。

的发现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从发现到研究、从猿人头骨的失踪到寻找，一直被世界关注。中国猿人陈列馆的建立和开放，表明国家已经意识到其保护、展示和研究的重要意义。这是对史前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博物馆学角度看，中国猿人陈列馆开创了一个博物馆新类型——史前遗址博物馆。只是当时对此认识还不十分清晰。

无独有偶，认识到西安半坡遗址的价值与建立西安半坡博物馆同样也经历了较长过程。1953年，半坡遗址在基建施工中被发现，随后进行的考古发掘，逐步将一座6000年前的史前村落遗址展示在世人面前。该遗址出土文物丰富，遗址保存状况完整，令考古学家欣喜不已。1958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建成开放（图1、图2）。



图1 20世纪50年代半坡遗址大厅建设工地



图2 1959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大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成两个史前遗址博物馆，一北一西，一旧石器时代遗址，一新石器时代遗址。两者遥相呼应，共同担负起开创史前遗址博物馆的重任。遗憾的是，西安半坡博物馆开放不久就受到了批评，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不得不在大会上作检讨<sup>[1]</sup>。此后史前遗址博物馆建设出现停滞，20年内未建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

## 2. 20世纪70—90年代：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快速发展

1978年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现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开放，开启了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至20世纪末，史前遗址博物馆的数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2座增加至18座。这一时期的史前遗址博物馆建设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的建成，标志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建设的复苏。不但将史前遗址博物馆的焦点由中国北方引向南方，还拓展了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学术视野：研究视角由单一的古人类转向人与人居并重。

其次，苏秉琦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各地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一方面佐证了这一论断，另一方面也为这一学说的普及提供了有效途径。

时间上，20世纪70—90年代史前遗址博物馆所依据的遗址，既有新石器时代的，也有旧石器时代的，甚至还有人类出现之前的动物化石遗址。地域上，则呈现遍地开花的形势。有东北的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阜新查海遗址博物馆；华北的上宅文化陈列馆、武安市磁山文化博物馆；西北的蓝田猿人遗址博物馆、宝鸡北首岭博物馆；华中的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华南的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马坝人博物馆（韶关市曲江区博物馆）；华东的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城子崖遗址博物馆；西南的自贡恐龙博物馆、元谋县元谋人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

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1987年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成。与在此前所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中已出现和古人类共生的动物化石不同，它将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内涵由单一的、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上溯至人类诞生前。该博物馆依托著名的恐龙化石遗址，拥有上万件的出土化石。不仅是中国第一座专题恐龙博物馆，也是亚洲第一座恐龙遗址博物馆。

### 3. 21世纪：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发展新态势

进入新世纪，与蓬勃发展的中国博物馆事业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同步，史前遗址博物馆呈现新的发展态势。据不完全统计，22年内已有41座史前遗址博物馆建成。建馆方式更加多样、博物馆分支类型更加丰富。

首先，以史前人类生活遗址为内容的史前遗址博物馆发展最快、数量最多，仍是史前遗址博物馆的主流。

一是一些著名的发现和发掘较早的史前遗址的博物馆化。20世纪是中国史前遗址大发现的年代，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些史前遗址长时间仅停留在教科书和专家的研究论著中，未能成为大众能够使用的文化资源。21世纪以来，一批经过科学发掘的史前遗址先后建成博物馆并对外开放。如长岛县北庄史前遗址博物馆、昂昂溪遗址博物馆、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良渚博物院、常州市圩墩遗址博物馆、大地湾博物馆、水洞沟遗址博物院、澠池县仰韶文化博物馆、大汶口文化博物馆、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召烧沟岩画博物馆、凌家滩遗址博物馆、马家浜文化博物馆、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泥河湾博物馆、荆门市屈家岭遗址博物馆等。

二是一批发现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史前遗址，考古发现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经快速筹备、审批，建成开放，有效缩短了遗址从发现到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周期。代表性的如三明市万寿岩遗址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朝阳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喇家遗址博物馆、南京直立人化石遗址博物馆、顶颚山遗址博物馆等。

其次，古生物化石遗址类博物馆异军突起。

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放之后产生了巨大影响，进入新世纪，古生物化石遗址博物馆呈一呼百应之势。从黑龙江到云南，从新疆到山东，一时应者如云。此阶段建成开放的代表性古生物化石遗址博物馆有：诸城市恐龙博物馆、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新疆奇台硅化木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昌吉恐龙馆、禄丰世界恐龙谷、内蒙古二连盆地白垩纪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青龙山恐龙蛋遗址博物馆、西峡恐龙蛋化石博物馆、广东南雄恐龙省级地质公园（博物馆）、宁夏灵武国家地质公园、甘肃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这些古生物化石遗址类博物馆多数以地质公园的形式面世，其特点是占地面积较大，且除遗址展示外，辅助展项较多，尤其是游乐项目深受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的喜爱。

再次，大遗址保护理念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促进了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发展。

“大遗址”一词出现较早，在1958年的“全国文物、博物馆全国会议”上就提及这个词，但作为文物保护理念是在世纪之交逐步确定下来的。2006年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公布《“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其中对“大遗址”的定义是：“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

史前遗址中的“大型聚落”“城址”“墓葬”都包含在这个定义之中，这些史前遗址大多离城市较远，保存面积较大，大遗址保护理念对史前遗址保护极为有利。

2009年，国家文物局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并于2010年评定出首批12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23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截至目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55家。2022年3月修订后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发布，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定义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传承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这些策略极大地促进了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发展。目前，史前遗址中已建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

正如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就修订后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大型古遗址保护利用融入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兼顾了文物安全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供了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随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利用模式被广泛接受、日益成熟，史前遗址博物馆必将获得更好的发展。

最后，社会力量介入史前遗址的保护和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建设。

改革开放后，政府倡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强调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提出明确要求。但是在实践中，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相关法规制度也不够完善，尚缺乏强有力的推进措施。在此情况下，宁夏水洞沟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就具有了独特的实践意义。

宁夏水洞沟遗址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该遗址很长时间游离于社会大众视线之外。2005年，鄂尔多斯企业家王亚伟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由其出资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最初进展并不顺利，后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和国内外考察的基础上，形成了建设水洞沟遗址博物馆的构想。2011年水洞沟遗址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仅陈列大厅就耗资5600多万元，展陈面积为3100平方米。博物馆还打造了沉浸式远古生活体验区，让游客置身于史前环境中。目前，水洞沟遗址博物馆已成为

宁夏甚至中国旅游的文化名片，成为中小学研学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水洞沟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中政府、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互动，各自发挥优势和专长。政府把握政策、宏观指导，承担遗址保护和管理的责任。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并颁布实施了《水洞沟遗址保护规划》，使遗址的保护、管理、利用和发掘、研究有章可循；妥善处理了在遗址区开展基础建设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修缮了位于遗址区内的明长城，使水洞沟遗址和明长城这两处国保单位交相辉映。政府部门与企业在准确理解和掌握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明确了相关方的责权利，明确了旅游资源开发不可触碰遗址本体、不可损毁文物、不可破坏遗址环境、不改变遗址管理权限的原则。

在学术方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遗址做持续调查、发掘和研究，发现新的地点和文化层位，不断拓展遗址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为基地，展开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的系统培训，将最新的野外发掘和信息获取技术及理念运用于考古实践，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前沿意识的青年人才。学者围绕该遗址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提出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创新性的观点和论述，还举办过数次国际、国内行业学术会议，推动和深化了有关史前人类迁徙、技术发展、生存模式等问题的研究和交流，提升了我国相关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企业则拓展文旅资源与市场，让遗产活起来、接地气，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

在这一模式下，遗产保护和利用并重，学术与科普比翼齐飞，文化与旅游高度融合，科研科普成果反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创新，最终实现保护、科研、科普、旅游互益共赢<sup>[2]</sup>。

此外，值得一提的新现象还有，城市中史前遗址博物馆建设，影响较大的有北京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该博物馆是北京东城区政府和东方广场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在东方广场地下十几米深处建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展厅陈列着在原址发现的石砧、石锤、石核、石刀，骨质的铲、刀等工具，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用火的遗物、遗迹和原始牛、鹿、鸵鸟的骨骼等。该博物馆建设的意义已大于博物馆本身，如公民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商业重地停工8个月的让步、商家在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给予博物馆一席之地等，无不体现时代的进步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深入人心。对史前遗址博物馆而言，这一事件将对未来城市建设中史前遗址的发现、保护和利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 三、史前遗址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提升与博物馆功能的拓展

与进入21世纪史前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相呼应，已有的史前遗址博物馆各项业务工作亦呈现出升级迭代之势。

第一，旧馆改造提升提上日程。

进入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飞速增长、建筑技术的日新月异，对史前遗址博物馆建筑提出了越来越高的目标，相形之下，建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史前遗址博物馆建筑亟须提升改造。客观地说，那些建设较早的史前遗址博物馆也曾引领时代风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先天的不足：面积狭小，文物库房和展厅面积不敷使用；功能不全，缺乏停车场和公共活动区域；建筑材料落后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史前遗址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发挥。

以西安半坡博物馆为例，半坡遗址保护大厅初建时是砖木结构，建筑面积仅2531平方米。开放40多年间，这座拱形建筑给中外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2000年五一期间，由于高温的烤灼，半坡遗址保护大厅的木质构件发生自燃。已运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遗址保护大厅的安危引起各方关注，馆方组织专家讨论后达成共识：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遗

址保护大厅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为更好地延续半坡遗址的寿命和为观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应对遗址保护大厅拆除重建。很快半坡遗址保护大厅改造工程得到政府立项。对遗址进行回填保护后，拆除了原遗址大厅。2006年建成钢结构遗址保护大厅4500平方米，框架结构的陶窑保护厅110平方米、文物库房2000平方米。新保护大厅的整体外形基本保持了原保护大厅的外形风格，但屋面结构则采用双层彩钢板夹保温棉，设有采光天窗，围护墙为砖砌，并以文化石装饰（图3）。改造既保留了原大厅的建筑风格，又满足了保护和参观的需要，并为其他史前遗址博物馆的老馆改造提供了思路。

第二，“一馆两址”“一园多点”模式的提出。

史前遗址，尤其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多为集群分布，每一个遗址都建博物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一园多点”不啻为一种理想选择。2006年，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在阳朔十里画廊图腾古道景区建成“甑皮岩古人类遗址阳朔展示馆”，形成了“一馆两址”的发展格局。通过对甑皮岩文化品牌的知识产权保护，使考古成果和文物资源成为无形资产，跳出了单纯依托遗址和文物进行转化的局限，探索甑皮岩文化多元展示、相关文创产品的异地供给，形成甑皮岩考古成果转化“一园多点”模式。

这种模式对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启发意义很大，即便没有相关的遗址作为依托，那么在已有的史前遗址博物馆附近选择环境相近的地方建设分馆，亦可收到扩大宣传、促进公众文化遗产意识提升的效果。

第三，史前遗址博物馆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很长时间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被视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一对尖锐矛盾。进入新世纪后，这一现象有所改善。

史前遗址博物馆在对内涵深入研究、挖掘的基础上，努力打造文化地标，实现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良渚申遗的成功给当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之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多年来，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深入研究甑皮岩在中华乃至人类万年文化史的地位作用，跟随桂林从实施‘文化立市’到‘文化强市’战略、从建设国际旅游胜地到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发展步伐，探寻甑皮岩遗址与桂林城市的关系，从核心学术成果提炼形成三个社会大众明了易懂的核心文化品牌——‘华南先祖’‘万年智慧’‘万年宜居’，为桂林赢得了‘万年智慧圣地’的美誉，使公众改变对甑皮岩遗址以往所



图3 2006年建成开放的半坡遗址保护大厅（内部）

谓‘原始、野蛮、落后’的认知，建构远古遗址与现代城市对话的新路径”。

第四，有关史前遗址的专项立法逐渐受到重视，史前遗址博物馆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1989年由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保护管理办法》，虽然该办法还属于政府规章，但开史前遗址专项管理办法风气之先，有重要历史地位。

进入21世纪，有关史前遗址的专项地方立法纷纷出台。截至目前，已经出台的史前遗址专项保护条例有：《辽宁省牛河梁遗址保护条例》（2010年）、《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2013年）、《三明市万寿岩遗址保护条例》（2017年）、《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2017年）、《杭州市萧山湘湖旅游度假区条例》（2018年）、《阜新市查海文化遗址保护条例》（2020年）、《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2021年）、《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条例》（2022年）等。

从史前遗址博物馆的角度解读这些专项立法，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专项立法与上位法相衔接。各地的史前遗址专项立法都充分注意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对遗址的保护原则、保护范围、各级政府的职责、保护规划的制定、违反规定的处罚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第二，作为专项立法，体现出从各地实际出发、有较之于上位法更加具体的规定。如《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将遗址保护分为“良渚遗址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控制区”三个级别，其中遗址保护范围分为重

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分为五类，而“遗址环境控制区”概念的提出更具有开创意义。再如，对遗址保护责任的规定，各地的条例都具体到遗址所在地的县级和镇人民政府，《三明市万寿岩遗址保护条例》还规定遗址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遗址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三，对保护管理机构的职责做出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如《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良渚博物院是良渚遗址出土文物的收藏单位和良渚遗址普遍价值和内涵的展示场所”，“良渚遗址出土文物应当及时向社会公众展示”。《三明市万寿岩遗址保护条例》规定万寿岩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展示出土文物和有关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和科普宣传教育，建立遗址信息数据库，向社会提供遗址信息展示服务”，《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规定石峁遗址管理机构“组织实施石峁遗址本体展示”“组织实施石峁遗址相关的文物和资料的征集、整理、收藏以及陈列展示”“开展石峁遗址相关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工作”。这些规定明确了作为史前遗址管理机构的史前遗址博物馆的法定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监督的依据。

法律法规意识的加强，规范了政府行为，对史前遗址的保护和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发展都具有长远的意义。

#### 四、史前遗址博物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回顾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历程，也有一些现象和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对这些现象和问题给予充分认识，将有助于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健康发展。

第一，史前博物馆相关的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由于没有及时地对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定义问题进行探讨，致使在很长时间内，“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定义被固化为“在史前人类活动遗址上建立的博物馆”，这制约了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发展，以至于古脊椎动物化石遗址博物馆和史前人类活动遗址博物馆长期各自为政、互不往来。这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再如，1998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苏东海先生就撰文指出“应该对半坡遗址博物馆进行更高的历史评价”，他认为：“当（20世纪）60年代西方博物馆界还在争论遗址能不能进入博物馆行列时，当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关于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才开始建议对遗址和景观‘应考虑建立专门博物馆’的时候，中国的西安半坡博物馆早已把博物馆建筑矗立在遗址

之上了。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西安半坡博物馆那样，建造这么宏伟的大厅把部落遗址科学地涵盖起来，从而开创了把博物馆和遗址环境融为一体之先河。西安半坡博物馆用事实回答了把博物馆建立在遗址上的种种疑问。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实践，从高起点上把传统博物馆的保护、科研、展示的基本职能与‘物加环境’的新思维出色地统一起来（图4）。”<sup>[3]</sup>而这个问题很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史前遗址博物馆界的重视，颇觉遗憾。

第二，对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发展历史的研究不足。历史的回顾和探索，对任何事业来说都是必要的。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历经70年发展，不论是对每一个个体，还是史前遗址博物馆整体来说，都足以形成可圈可点的历史。2020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设立了“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研



图4 西安半坡博物馆大门

究”课题，是这方面的努力之一。除此之外，史前遗址博物馆应该系统梳理自身的发展史，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第三，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多样化问题被忽视了。以在史前人类活动遗址上建立的史前遗址博物馆为例，其所依据的史前遗址，除了个别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几乎清一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其突出的特色和地位受到重视是正常的，但是不是同时意味着其他各级小型的、低级别的史前遗址就没办法发挥作用了？级别高、规模大的史前遗址可以建成大型史前遗址博物馆、史前遗址公园，乃至申报世界遗产，但是小型的、点状的、级别低的史前遗址可否建成小型的博物馆，乃至街心公园，甚至只是标识性的观赏点？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若是能够获得突破，则史前遗址博物馆将会呈现满天星斗的诱人景象。

第四，史前遗址本体的技术保护是一个仍没有解决的问题。史前遗址博物馆发展的历程中，遗址本体的保护问题一直如影随形，目前已找到了遗址物理保护和展示的有效方式；但遗址的风化，尤其是土遗址的风化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史前遗址博物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技术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要彻底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尚待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第五，史前遗址博物馆的管理方式值得商榷。对多数史前遗址博物馆来说，都面临遗址规模大、头绪多的问题，适应这种形势的管理方式也一直在探索中，且也确实总结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提级管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不少。但也有一些地方做法相反，如西安半坡博物馆和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就由省属改为市属，这种“降级管理”方式的利弊如何，尚需时间来检验，但此举对业务工作视野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

## 参考文献

- [1] 在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上郑振铎副部长的讲话[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3).
- [2] 高星. 水洞沟遗址: 科学与人文在这里交融[N]. 人民日报, 2020-10-09(20).
- [3] 苏东海. 应该对半坡遗址博物馆进行更高的历史评价[G]//西安半坡博物馆. 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